

党史教学
参考资料

周总理光辉战斗的一生

杭州大学中共党史讲义编写组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英勇坚定的反修战士，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领导人。

敬爱的周总理，五十多年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周总理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无论白色恐怖多么残酷，革命战争多么激烈，国际斗争多么复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遇到多少艰难险阻，周总理总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勇敢捍卫

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阶级敌人斗，同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斗，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念，受到了毛主席的无限信赖。周总理赤胆忠心，光明磊落，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是实行毛主席倡导的“三要三不要”原则的光辉典范。周总理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全党全军各级领导干部的表率。周总理为争取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争取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全部智慧，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尊敬，在世界革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这伙阴谋家、野心家，对周总理恨之入骨，丧心病狂地反对和陷害周总理，妄图架空毛主席，分裂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四人帮”倒行逆施，疯狂反对周总理，丝毫不损于周总理的光辉业绩和高大形象。“四人帮”越是反对周总理，我们革命人民越是怀念和崇敬周总理，越是要宣传周总理，学习周总理。我们一定要以敬爱的周总理为光辉榜样，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五四运动和党的创立时期

领导天津学生运动，创建“觉悟社”

周总理出生于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祖籍浙江绍兴，在江苏淮安长大。

周总理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九一三年，周总理小学毕业后，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在校时，他组织了“竞业乐群社”，团结了许多同学，互相督促，共求进步。一九一七年，中学毕业后，周总理去日本读书，先进东京神田区高等预备学校，后入政法大学。这时，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已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乘大战期间，英、法、德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之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妄图独霸中国。我国正处在水深火热、灾难深重之中。周总理十分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为，他积极组织 and 领导中国留日学生，多次举行秘密集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

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五月七日，天津各校学生纷纷响应，举行示威游行。十四日，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二十三日，又有一万多学生举行了罢课示威。运动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敌人决不甘心失败。七月，河北省教育厅长王章祐，竟用提前

放假，推迟开学的办法，妄图扑灭天津的学生爱国运动。而一部分学生的斗争情绪已经松懈，运动开始沉静下来。正在这时，周总理从日本回到天津，组织和领导了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使运动又立即活跃起来。天津学联负责人马骏邀请周总理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总理欣然承担此任，并说：《学生联合会报》是非常必要的，要想学生爱国运动能坚持下去，必须注重爱国教育。我所以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救国的斗争，同学们既然需要我编辑学生会报，我愿与大家共同努力，负些责任是义不容辞的。七月二十一日，《学生联合会报》出版了。周总理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革新，革心》的社论，提出了要改造社会和自觉地改造思想的主张，给同学们以极大的启发。大家争相阅读，认为这篇社论说出了自己心中的要求。马骏拿着第一期会报，高兴地说：“看！看！这篇社论真带劲呵！这比我们站在几千人面前大喊一阵，可有用得多咧！”周总理主编的学生会报，不断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野心和种种阴谋，使人们更认识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它称霸世界、侵略中国的步骤；不断地揭露卖国政府一味屈从帝国主义，压迫人民，媚外辱国的原因，唤起人民奋起，打倒封建官僚统治。会报使许多学生振奋精神，继续参加战斗。由于会报内容丰富，言论精辟，影响很大，群众纷纷购买，很快由三日刊改出对开一大张的日报，每期日销两万份以上。总之，会刊在组织、教育广大天津学生，宣传爱国思想和领导天津学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当时，山东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直接受害地区，济南的抗日爱国运动格外高涨，而反动派的镇压也更为残酷。因

此，山东特派代表到天津呼吁求援。周总理立即给予积极支持，一面在会报上公开揭露卖国政府与人民为敌的残暴政策，号召人民加紧团结斗争；一面与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商讨推派各界代表十人到北京请愿。结果，请愿代表在北京被捕。面对这种情况，周总理沉着地说：“这正是掀起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用不着惊慌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被捕，只要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但营救他们，是我们的责任。”简短的话语，使大家振奋了起来。马骏带领代表上京营救。八月二十六日，京、津两地三、四千名请愿学生，公推马骏为行动总指挥，前往卖国政府的总统府请愿、抗议。反动派又逮捕了马骏等人。周总理立即亲赴北京，为营救被捕代表进行了坚决斗争，迫使北京反动政府不得不将本来企图枪杀的被捕代表全部释放。

五四运动后，各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新思潮的社团和刊物，象雨后春笋般地日益增多。九月初，周总理和赴京请愿代表一同乘火车回津。在旅途上，他们商谈“今后怎么办？”这时，周总理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已经倾向于社会主义。他倡议建立一个比学联的组织更为严密的团体，同时出版一个宣传刊物。在周总理领导下，九月十六日上午，男女同学中的积极分子马骏、邓颖超、郭隆真等二十人，在天津草厂庵学生联合会的办公室里，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上讨论了团体的组织机构、出版刊物和组织发展等问题，并通过了由周总理起草的十项决议。决议规定，这个团体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因此出版的刊物取名为《觉悟》，这个团体就叫“觉悟社”。觉悟社是一个进步的革命团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它在组织上是比较严密的，规定新社员入社时必须要有社员三人以上介绍，并由介绍人报告被介绍人的优缺点，然后经大家评论，得到全体社员允许，方得加入。加入的条件是要具有“牺牲”、“奋斗”、批评和受批评的精神。其次，它初步运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经常在社员间进行互相批评，确保组织的战斗力。第三、它充分发挥了民主精神，对一些重大问题都进行共同研究和反复讨论，保证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致。因此，它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

觉悟社成立后，周总理经常主持集会，组织大家谈论和研究一些新思潮，并经常亲自给大家讲国际国内的形势，揭露日本侵略我国的野心和阴谋，指出：日本对灭亡中国，处心积虑已久，即或巴黎和会拒绝了签字，野心的日本，也决不会甘心，必然会另出新花样。这就进一步启发了大家的民族爱国心，加深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切齿仇恨。周总理还给大家讲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意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引起了大家对苏联革命的憧憬。

觉悟社创办的《觉悟》，是当时一个“灌输世界新思潮”、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由于社员忙于参加爱国运动，到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日才出版。周总理为《觉悟》刊物写了题为《觉悟》的发刊词和《觉悟的宣言》两篇文章，公开宣告：“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应该铲除应该改革”，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当时，他们在《觉悟》刊物上发表文章，都不具自己的名字，大家用号码来代替，二十个人，写了五十个号码（准备继续发展社员）

抽签。周总理是五号，所以他就叫“伍豪”，邓颖超是一号，所以她又叫“逸豪”。以后，周总理和邓颖超还分别用过“伍豪”、“逸豪”的笔名。

觉悟社成立后，天津的爱国运动大有进展。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觉悟社发起和组织了天津市民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抗议反动当局武装镇压爱国运动，结果又遭迫害。对此，周总理亲自写了宣言，揭露反动当局的罪行，向社会呼吁，要求惩办罪魁祸首。十二月，觉悟社又组织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天津国民大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福州惨案的罪行。一九二〇年一月底，周总理又领导天津学生，举行反抗大运动，一千多人进行街头讲演，散发传单，到省公署请愿，强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恢复天津学联，释放被捕代表。当省公署派兵包围学生时，周总理临危不惧，登上梯子，责问反动当局为什么无故派兵包围学生。在运动中，周总理和马骏、郭隆真等二十多人先后被捕。在狱中，周总理领导大家以绝食等方式继续进行反抗斗争。反动当局的罪恶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恨，到处展开了反对帝国主义运动，迫使敌人在同年七月，将被捕的代表全部释放。

一九二〇年八月初，觉悟社召开年会。会上，周总理总结了一年多来天津青年学生和各界救国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只有把“五四运动”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改造旧中国的主张。于是决定争取李大钊的指导和支持。十六日，在李大钊的指导下，觉悟社社员和北京的几个进步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召开会议。会上，周总理阐述了觉悟社年会上提出的“联合改造”的意义。邓颖超报告了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

年多来的活动。会后，发表了《联合改造的宣言》和《约章》，提出了我们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必须以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并且提出了“到民间去，切切实实的做点事”的口号。

周总理早期在天津的革命活动，为我党培养了一批干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有一部分觉悟社社员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有的还成为某些地方党团组织的第一批党员、团员，为革命作出了贡献。

赴法勤工俭学，领导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革命斗争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先进的中国人渴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当时，苏联正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不可能直接到那里去学习，而东欧德、奥、捷各国无产阶级又正在举行革命，因此，到靠近革命高潮地区的法国去勤工俭学，一边做工，一边学习，就成为革命知识分子的迫切要求。毛主席积极提倡和支持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九二〇年秋，周总理先到法国后到德国勤工俭学。在这个时期，先后到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的还有朱德、陈毅、聂荣臻、李富春、蔡和森、蔡畅、徐特立、赵世炎、陈延年、向警予等人。

周总理到法国后，住在巴黎的贫民窟里，一面当矿工，一面在巴黎大学政治系听课。在那个时候，他专心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经常和蔡和森等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并

参加蔡和森、陈毅等组织的“工学互助社”的活动，从事社会主义的研究，反对无政府主义。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使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从此，中国革命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同年年底，周总理同赵世炎、陈延年等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建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并担任了书记，与中共中央建立了关系。一九二二年，周总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二年七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改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周总理从德国到巴黎参加旅欧总支部成立大会。旅欧总支部由旅法支部、旅德支部和旅比支部组成。周总理和赵世炎、陈延年等在旅欧总支部成立大会上，被选为总支部的领导成员。大会决定出版一种党内学习与教育性质的油印刊物——《少年》，即共产少年之意。会后，周总理回德国作报告。十月，在柏林会见了刚从上海来的朱德。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旅欧总支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增选了总支部的领导成员，决定出版机关报《赤光》，以代替原来的《少年》。

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后，一开始就在旅法华工中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在巴黎附近的比央古工业区，党把华工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夜校，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少年》第二期上，周总理还发表文章，通俗地解释共产主义原理，用以提高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的阶级觉悟。

同时，旅欧总支部还开展了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间，曾琦、李璜等一小撮为帝国主义和封建

军阀服务的国家主义派分子，在巴黎搞了一个中国青年党，标榜国家主义，进行反共活动。为了清除其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反动影响，并在斗争中开展理论学习运动，每逢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周总理亲自到巴黎底拉丁区(大学区)和近郊比央古区(工厂区)的小咖啡馆里，向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发表演说，无情地揭露国家主义派献媚日本和反对人民利益的真面目。有时，周总理还把曾琦、李璜一伙找来，或亲自去，在会上同他们辩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驳斥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谬论，听众鼓掌不绝。周总理每次富有说服力的演说，都传遍了巴黎的比央古、蒙达尼的中国工人和勤工俭学学生中。党还通过《赤光》，发表一些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文，深受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的欢迎，使国家主义派的喉舌《醒狮》迅速垮下来了。结果，国家主义派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完全陷于孤立。所有的进步分子都紧紧围绕在旅欧总支部的周围。

为了培养党的干部，旅欧总支部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派人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三年三、四月间，周总理亲自伴送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等十余人到柏林办理去莫斯科的手续。接着，又于十一月间，再次伴送聂荣臻、刘伯坚、李俊杰(卓然)等十余人，到柏林办理手续。

周总理等在领导旅欧总支部的工作中，进行了大量的革命活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为党培养了不少优秀干部，为创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革命时期

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周总理在领导旅欧总支部进行革命活动期间，国内的革命运动，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已有很大的发展。一九二三年，党的“三大”决定了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一九二四年一月，党帮助孙中山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五月，党与孙中山合作，又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建立，预示着革命高潮的即将到来。在这大好形势下，周总理受党的委托，从巴黎回国，参加黄埔军校工作，担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党还先后委派叶剑英、聂荣臻、恽代英、肖楚女、熊雄等到该校担任政治工作和其他工作。周总理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工作，以革命精神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其中包括不少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对以后的革命斗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周总理在广东，先后担任了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长，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了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买办阶级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为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工作。一九二四年十月，英帝国主

义指使买办、国民党右派陈廉伯、陈恭受发动了广东“商团”武装暴乱，妄图推翻广东政府，建立“商人政府”。云南军阀范石生支持了这次叛乱，国民党右派竭力主张和商团妥协。广东政府处在极端危急之中。为了平息商团叛乱，粉碎英帝国主义的挑衅，十月十一日，周总理和陈延年等帮助孙中山改变妥协态度，团结了国民党左派，组织了作为临时军事指挥机关的革命委员会。十六日，革命委员会依靠了工团军、农团军和黄埔军校学生等革命武装，取得了广州革命群众的支持，一举歼灭了商团反革命武装，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初步稳定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十月三十日，周总理在《向导》上发表了《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一文，分析了商团阴谋叛乱以来广州的政治形势和各阶级的动态，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提出了当时的斗争任务和策略。周总理指出：商团叛乱平定以后的英帝国主义决不会停止推翻广东政府的阴谋活动，“纵然商团一时溃散了，但四乡与商团同性质的民团仍在；纵然二陈及商团代表一时逃走了，但买办阶级依然存在，纵然陈炯明一时未能打入广州，但帝国主义可利用的军阀原不止陈炯明一派。”因此，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买办阶级，仍然企图勾结起来镇压和破坏革命运动。周总理指出：国民党右派“在其经济地位上说，在其个人利害上说，他们是永远不会反对帝国主义的”，他们“想从军阀的分赃会议中得到革命的代价”，“乘机分得一份政权而与一丘之貉的军阀及帝国主义者去合作。”周总理指出，国民党中派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买办阶级的进攻面前，往往没有勇气“去图进攻”，“希图妥协苟安下去”，常常表示退

让。周总理又指出：“革命的左派”“与帝国主义决裂非常坚决”，他们“领导的工农群众受着极大的摧残和压迫，却万分忍耐不住了；他们主张立刻以少数的可靠的革命力量向一切反革命的商团和军阀下总攻击，以决最后的死战。”最后，周总理作出了结论：“国民党右派是永不革命的，是永远希望和军阀帝国主义勾结的，而革命的只有左派，只有工农学生群众。”“当前的急务是‘肃清内部’”，即开展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派分子必须打破他们妥协的心理，断然离开不革命的右派”，“与革命的左派联成一气，实行国民革命”。这样，周总理就明确提出了依靠左派，团结中派，孤立和打击右派的斗争策略和开展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任务。周总理认为只有这样，国民革命“才能得到革命的工农群众作革命的基本势力”，“才能免除不革命的耻辱和妥协的色彩”，“根本铲除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将广东政府从军阀挟持中解放出来”。

接着，周总理又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向导》上发表了《中山北上后之广东》一文，进一步揭露了国民党右派抢夺广东政权的阴谋活动，指出：国民党右派“乘着中山北上无人监督的机会，群起攘夺广东的权力地位”，他们借孙中山“市政还诸市民”的主张，搞了一个所谓市长民选的活动，阴谋通过剥夺近郊二十多万农民和许多市民的选举权，用包办选举的办法抢夺权力。这个阴谋活动，由于我党领导的工农群众、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的抵制虽未实现，但“我们不久必可看到右派在广东抢官的第二幕活剧”。周总理又揭露了南方各派军阀抢占地盘的罪恶行径，指出：“久困在广东的各军阀，都看透了久留广东无益”，“群思向外谋更大的发

展”，有的“极力攻讦”，有的“努力谋湘”，有的想“立即回桂”，有的要“长驱回滇”，尤其是那些“平日表面上都是自命为国民党员的龙虎将军，现在乘着中山北上，群龙无首的时期，都十足地表现出他们与国民党尤其是与广东国民政府无关了”。这样，周总理的这篇文章，再次提出了必须继续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为了巩固广东政权，周总理还积极参加和领导了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一九二五年二月，在我党的倡议和领导下，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了第一次东征。由于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黄埔学生军的英勇作战，和东江农民的大力支持，到二月底，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占领了潮、汕。六月，广州各界人民，为了声援香港、沙面工人大罢工，举行反帝示威大游行。周总理给予积极支持，从军队中抽出两个营，从军校中抽一个营，参加了这次大规模示威游行。黄埔军校的学生军扩大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周总理亲自兼任了该军的政治部主任。十月，以第一军为主力，广东革命军举行了第二次东征。蒋介石窃取了东征军总指挥的职位，处心积虑地要限制我党在军队中力量的发展。周总理同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东征途中，蒋介石召集了一个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竟公开鼓吹什么黄埔不可分裂，无理要求周总理把所有在黄埔以及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单统统交给他。周总理看出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因此，公开声明此事关系两党，须请示我们党中央才能决定。这样，就把蒋介石的无理要求顶了回去。蒋介石仍不死心，在与周总理的个别谈话中，又要了一个花招，说什么为了保证黄埔的统一，或者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或者共产党员退出黄埔与国

民党。但又怕露了他的马脚，便假惺惺地表示，这是他不愿意的。周总理对此根本不予理采。周总理就用这种巧妙的斗争策略，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第二次东征，取得了最后消灭陈炯明部队的胜利。接着，又击溃了盘据广东南部的邓本殷部队。至此，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统一和巩固，为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

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随着革命运动的高涨，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国民党右派，力图把革命领导权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去，扭转革命方向。如何对待国民党右派的篡权阴谋，在党内存在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根本分歧。周总理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坚决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张击退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举行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筹备期间，周总理赞同毛主席，主张对国民党实行打击右派，削弱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在大会上开除一批公开反对共产党、反对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争取在改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时，使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绝对优势。陈独秀却反对这个政策，认为打击右派会把整个资产阶级吓跑，主张非把他们挽留在统一战线之内不可。通过毛主席、周总理等和国民党左派的共

同努力，使到会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了极大的优势，这就保证了大会能够继续执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并对右派进行了有力的斗争。但是，在大会上，由于陈独秀的妥协退让，结果国民党反而扩大了右派势力，右派和中派占了国民党中央的优势。特别严重的是把蒋介石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让他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监，这就为资产阶级篡夺革命领导权造成了有利条件。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占领了中山舰和海军舰队，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包围了东山苏联顾问处，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并逮捕了李之龙等五十余名共产党员，还拘捕了周总理为首的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全体共产党员。在这场著名的“中山舰事件”中，周总理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对蒋介石进行了种种斗争。在事件发生前，蒋介石曾打电话要周总理回来。周总理回来后，看到蒋介石与右派的来往密切，行动鬼祟，就将情况告诉当时任苏联顾问的助手和翻译张太雷，要警惕蒋介石的阴谋活动，而苏联顾问不重视此事，把一个政治大问题当作小问题对待。事件发生后，两广区委以毛主席、周总理为代表，主张对蒋介石的猖狂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认为“我们不仅不应当容忍三月二十日的事变，而且应当进行一个自己的三月二十日事变”。但是陈独秀生怕得罪蒋介石会破坏统一战线，顽固地拒绝毛主席、周总理的正确意见，继续主张退让，结果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

一九二六年七月，在我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北伐军正式开始了讨伐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为了防止蒋介石篡夺革命的领导权，在北伐出师之前，周总理亲自去上海，特地